

特朗普 2.0 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 交易主义外交的视角

黄萌萌

内容提要：“交易主义”是一种拥有现实主义底色的务实性外交策略，具有狭义国家利益观、零和博弈世界观和民粹主义特性。交易主体基于各国实力差异，通过双边谈判或“软硬兼施”手段将不同政策议题进行联动交易，其联盟政策是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而非联盟价值观。特朗普政府实施“交易主义”外交，以“美国优先”为内核，在联盟防务与经贸关系上呈现出显著的“自利性”，以“成本收益”视角对待盟友，重塑二战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联盟防务上，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从“承诺义务”变为“交易账单”，忽视自由主义价值观对维护北约军事同盟的长期作用。经贸关系上，美欧从“基于规则”的经济战略伙伴走向“零和博弈”的利益伙伴。特朗普政府马基雅维利式的交易主义外交与欧洲自由主义理念对冲，削弱了同盟互信与对华战略协调合力。近年来，中美欧三边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竞合状态，在美国“交易主义”外交的作用下，欧盟在大国竞争中陷入战略迷茫。“交易主义”外交不仅动摇了跨大西洋同盟根基，也削弱了基于联合国宪章与多边主义原则的战后国际秩序。

关键词：交易主义 美欧关系 特朗普 2.0 时期 联盟政策

一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特朗普 2.0 时期的美国背离传统联盟政策，无论是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还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均大肆批评欧盟民主制度、经济与

社会模式以及欧洲规范认同。^① 欧盟政界认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更为严重,自由主义价值观与西方民主模式难以继续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粘合剂有效促进美欧战略协调。欧洲学界广泛关注特朗普 2.0 时期的外交理念,从特朗普主义、门罗主义、主权主义、民粹主义等视角切入,指出特朗普时期“美国优先”思维与欧盟规范性认同难以共鸣,有欧洲学者甚至提出特朗普 2.0 时期跨大西洋同盟将暂时终结。^②

然而,主权主义、民粹主义与门罗主义不足以全面概述特朗普 2.0 时期的外交行为特征。美国致力于重塑联盟关系,无论是北约联盟防务还是美欧经贸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及“交易”,要求获取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条件,很少强调传播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美国副总统万斯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言,特朗普政府拥有“交易”思维,即使美欧之间文明链接深厚,但仍需改变联盟合作方式,欧洲国家应承担更多联盟防务支出。^③

由此可见,特朗普 2.0 时期“交易型”外交改变了跨大西洋同盟传统合作模式,引发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当前有关“交易主义”外交的研究聚焦于三个方面。

第一,研判特朗普时期美国实施“交易型”外交与安全政策。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强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获取即时收益,忽视国际多边机制为其带来的长期收益,实施零和博弈的“交易型”外交,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形象。^④ 库利(Alexander Cooley)和尼克森(Daniel Nexon)提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交易型”外交,要求从

① Christina Nagel, “US-Sicherheitsstrategie: Zwischen Zeitenwende und Zurückhaltung,” *Tagesschau*,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innenpolitik/us-sicherheitsstrategie-bundesregierung-afd-100.html>.

② Jiffer Bourguignon, “Trump 2.0—vorläufiges Ende der transatlantischen Allianz?” *Wirtschaftsdienst*, Vol.105, No.1, 2025, pp.2-3.

③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videos/vice-president-jd-vance-delivers-remarks-a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④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5, No.1, 2019, p.70; Joseph S. Nye, “Trump’s Transactional Myopia,” *The Strategist*,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rumps-transactional-myopia/>.

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和市场红利的盟友那里获取更多利益,否则以美国退出联盟机制和国际多边机构相要挟。^①斯托克斯(Bruce Stokes)认为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美国从二战后追求“制度性利益”变为纯粹的“交易型政策”。^②孙成昊等提出特朗普 2.0 时期北约运行模式从以制度承诺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转向以成本收益为核心的“安全交易”。^③丹多洛夫(Philip Dandolov)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交易主义”外交,旨在获取短期收益,反对多边主义和联盟价值观,这令美国失去联盟信任,削弱其全球霸权。^④弗里德里希斯(Gordon. M. Friedrichs)认为特朗普将美国霸权衰落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无论是对竞争对手还是盟友,一切均需以美国利益为先,在跨大西洋关系上,美国同样扮演着“交易型”大国角色。^⑤上述研究发现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与联盟政策转向“交易型”,以“成本收益”计算和“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但有关“交易主义”外交的概念缘起及其行为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仍有待构建。

第二,通过“交易主义”视角分析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变化。相关研究关注特朗普政府如何通过“交易主义”政策处理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在经济领域,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期间均需要承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或许诺在美国投资,以换取美国继续对其保持市场开放。^⑥在区域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指责韩国和日本搭美国安全便车,要求它们承担更多的区域安全责任。有研究指出特朗普 2.0 时期,中美战略竞争、美国亚太战略收缩和美国“交易型”联盟政策之间产生

① 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 “Trump’s Antiliberal Order: How America First Undercuts America’s Advantage,” *Foreign Affairs*, Vol.104, No.1, 2025, pp.16–23.

② Bruce Stokes, “Setting the Table: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US–EU Relation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E 739.278, December 2022.

③ 孙成昊、李佳霖:《特朗普 2.0 时代重塑北约防务分担的特征、动因及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4 期,第 31 页。

④ Philip Dandolov, “The Insistence on Transactionalism and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Some Long-term Risks and Disconnects,” *Knowledge–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0, No.1, 2025, p.87.

⑤ Gordon M. Friedrichs, “The Age of the Disaffected Voter: American Democracy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85, No.1, 2025, pp.1–16.

⑥ Alan Chong, “Trump and Southeast Asia: Portents of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RSIS Commentary*, No.207, November 2, 2017.

目标冲突,削弱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①上述研究主要从“交易主义”视角分析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转变,但对美国另外一个重要同盟关系,即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变化缺乏关注。实际上,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同样以“交易型”外交方式对待欧洲盟友,这与欧盟建制派所主张的西方价值观共同体格格不入,这导致美欧双方在联盟防务、经贸投资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不断。

第三,从“交易主义”视角分析国际和平进程以及中等国家间互动。“交易主义”并非是特朗普政府专有外交,赫尔穆勒(Sara Hellmüller)和萨拉莫(Bilal Salaymeh)讨论了“交易主义”在国际和平进程中的作用,通过对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和平进程的实证研究,发现为交战方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也会参与缔造和平,各方通过“交易”缔结和平协议,“交易主义”成为国际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运作方式。此外,在不稳定的区域秩序中,中等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和维护经济利益也会采用“交易主义”策略。^②图尔汉(Ebru Turhan)指出德国与欧盟为应对欧洲难民危机而与土耳其签署难民协议,将欧盟难民治理问题外部化,欧土关系由此转向“交易型”。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与欧盟在土耳其国内民主问题上逐渐采取谨慎立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与土耳其意识形态分歧加深,欧土关系中的“交易性”不断增强。^③

由上可见,既有研究发现特朗普 2.0 时期推行“交易主义”外交,但存在概念模糊问题,且缺乏对“交易主义”外交行为逻辑的系统性分析。此外,相关研究虽然关注到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关系转向“交易型”,但从“交易主义”视角研究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转变尚有提升空间。此外,特朗普 2.0 时期“交易主义”外交严重冲击跨大西洋关系,在联盟安全与经贸问题上,欧盟难以再凭借共同价值观拉住美国保持跨大西洋战略协同,这对未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与国际秩序竞争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美国是如何通过“交易主义”外交重塑跨大西洋安全与经贸关系?

① Kuyoun Chung, “U.S.-ROK-Japa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 Policy*, Vol.20, No.1, 2025, pp.2-7.

② Mohamed Aldhuhoori, “Middle Powers’ Transactionalism in the Trumpism Era,”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No.3, 2025, pp.613-614.

③ Ebru Turhan et al., “Germany’s Central Role in EU-Turkey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 *German Politics*, Vol.34, No.4, 2025, pp.643-662.

这对跨大西洋关系与国际秩序走向又有何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厘清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行为特征,丰富“交易主义”外交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案例部分,本文重点关注北约联盟防务与美欧经贸关系,从“交易主义”外交视角评析特朗普 2.0 时期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这对研判未来美欧关系发展以及国际秩序走向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外交

(一)“交易主义”的分析框架

“交易主义”在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领域被广泛谈论,其意涵已超越买卖、借贷、资源配置与成本管理等范畴。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对“交易主义”进行概念溯源,发现“交易主义”拥有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特性。在哲学讨论中,“交易主义”用于研究人类社会交换与交易的复杂性,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反对僵化的价值信条。杜威(John Dewey)提出“交易”是一个“探究”与“观察”过程,他认为政治二元论思维限制人类自由思想和行动。个体、环境和社会系统之间发生持续互动,个体经过“探究”产生的既有解释均是临时性的,可在任何阶段进行修改,交易过程受到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影响。^①在经济学讨论中,“交易主义”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特性。经济行为体拥有自利性,需要不断适应环境,甚至使用诡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较少考虑既定规则、长期后果和道德约束。^②由此可见,“交易主义”在哲学与经济学概念范畴中呈现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可变性、短期性以及利益导向型的特征,并不重视价值观的传承。

“交易主义”被应用至国际关系领域时,其继承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利益驱动的逻辑内核,这与强调价值观与联盟机制的自由主义理念有显著区别。^③约瑟

^① Robert Mulligan, “Transactional Economics: John Dewey’s Ways of Knowing and the Radical Subjectivism of the Austrian School,” *Education and Culture*, Vol.22, No.2, 2006, pp.61-82.

^② Oliver E. Williamson, “Opportunism and Its Critic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 14, No.2, 1993, pp.97-107.

^③ Mohamed Aldhuhoori, “Middle Powers’ Transactionalism in the Trumpism Era,” pp.613-614.

夫·奈在划分美国总统类型时提出“交易型”领导者(Transactional Leader)的概念,即通过使用硬实力资源、“胡萝卜加大棒”方式和胁迫、收买与讨价还价的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政治技巧来获取追随者的服从。^①帕特尔(Ketan Patel)和汉斯迈耶(Christian Hansmeyer)认为“交易主义”旨在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将风险尽可能转嫁给他国。^②实际上,基于国家间实力差异,交易行为主体的经济体量与军事实力越大,利益交换筹码就越多,这有利于大国凭借硬实力资源向小国施压,小国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为此,在交易过程中,大国与小国面临的风险是“非对称”的,“交易主义”对小国的负面影响更大。^③

特朗普执政时期将其在商业领域“讨价还价”经验运用至对外政策上,其所强调的“交易的艺术”是通过激化矛盾、极限施压,将局势推向冲突与破裂的边缘,在最后一刻达成交易。^④自此,“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在外交政策领域被广泛讨论。它被视为一种外交策略(Foreign Policy Approach),以务实性、硬实力、双边谈判、短期收益为目标,忽视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联盟承诺。^⑤“交易主义”思维被指主导特朗普时期美国联盟政策,美欧传统联盟合作方式难以为继,美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再是传统上的承诺与义务行为,而是一种对共同责任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行为。赵怀普指出美欧关系已从价值观“天然盟友”转向实用主义的“交易型”联盟。^⑥

① Joseph S. Nye,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Presidents,” *Leadership*, Vol.10, No.1, 2014, pp.118-124.

② Ketan Patel and Christian Hansmeyer, “Multilateralism to Transactionalism: America and Trump in the Asia Pacific,” in Oliver Turner and Inderjeet Parmar, e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Obama’s Legacy and the Trump Trans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10-224.

③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49页。

④ “World Insights: Trump’s ‘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 Hits Deadlock,” Xinhuanet, March 23, 2025, <https://english.news.cn/20250323/99e6a3d6971e4bf0afd05ade81534086/c.html>.

⑤ Galib Bashirov and Ihsan Yilmaz, “The Rise of Transac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2, 2020, pp.165-184.

⑥ 赵怀普:《大变局时代的跨大西洋同盟调整与中美欧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第184-185页。

“交易主义”外交策略实际上是美国处于自由主义霸权衰退期的现实选择。纵观历史,当美国实力相对衰微时,其全球责任、联盟承诺与国家利益往往陷入纠葛。^①“交易主义”行为逻辑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看来,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多边机构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主张美国履行联盟义务,维护西方价值观,并通过人道主义干涉确保全球影响力。^②但“交易主义”外交要求美国专注于大国战略竞争,将主要资源用于遏制崛起国,必要时可违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动美国从“自由主义霸权”转向“非自由主义霸权”。^③

“交易主义”外交具有现实主义逻辑底色,并汲取大国权力竞争的理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张力,美国首要战略目标变为遏制中国崛起。^④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国际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整合联盟体系遏制中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仍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重要目标,但其现实主义行为逻辑十分明显,认为美国无论是和盟友还是和对手打交道,竞争是永恒主题。^⑤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就提出大国权力竞争是世界主旋律。^⑥特朗普第二任期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不仅提出军事平衡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主张实行门罗主义中的“特朗普推论”,旨在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美国实力和实现美国优先事项,认为这符合美国安

① 曹国涛:《“自由国际主义”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第二卷〈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5月31日, https://www.cssn.cn/gjgc/mhgj/202405/t20240531_5756140.shtml。

②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1998/99, pp.43-78.

③ Barry R.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p.20-27.

④ 吴白乙:《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美战略之争》,载《国际展望》,2024年第6期,第47页。

⑤ Martin Wolf, “The Long and Painful Journey to World Disorde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5,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ef13e61a-ccec-11e6-b8ce-b9c03770f8b1>.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全利益。^①

然而,“交易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外交又有所区别。一方面,“交易主义”外交并不重视联盟体系建设,而是将联盟承诺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掣肘,因为维持联盟体系运转需要投入大量军费和对外援助支出,这不符合“交易主义”获取即时物质收益的目标。而传统现实主义外交将美国联盟体系视为全球权力平衡重要工具,强调联盟战略带来的长期收益。鉴于此,“交易主义”常被批评为缺乏长远的战略考量。^②另一方面,“交易主义”主要通过“离岸平衡”而非“深度介入”的手段来维持美国全球权力地位。^③然而“交易主义”并不等于“孤立主义”,美国仍会通过北约、双边或小多边机制参与国际事务,只是从维持全球军事布局转向在关键地区稳固美国主导权,降低海外军事支出。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下调了欧洲的战略优先级,强调拉美地区是美国维护在西半球战略主导地位的重点所在。但美国并非放弃欧洲,而是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该战略凸显了美国利益至上、联盟责任分担以及均势思想。^④为此,特朗普政府始终拒绝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避免因承担过多欧洲安全责任而令美国国家利益受损。

综上,“交易主义”外交拥有现实主义世界观,其逻辑底色是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极致追求。为此,在分析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特征时,本文将主要选取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式,遵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按照该路径,外交策略是国家权力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驱动外交行动的首要因素;首先要通过已有实力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其次要选择能够最有效实现国家目标的外交手段;最后要基于对象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实力,评估双方外交目标互动的兼容性,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15, pp.23-27.

② Galib Bashirov and Ihsan Yilmaz, “The Rise of Transac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p.168.

③ Ville Sinkkonen, “Contextualizing the ‘Trump Doctrine’: Realism, Transactionalism and the Civilizational Agenda,” *FIIA Analysis*, No.10,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2018, p.16.

④ Niall Ferguson, “The Truth Abou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Free Press,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thefp.com/p/niall-ferguson-the-truth-about-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由此制定联盟政策。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通常忽视外交行为中的社会因素,而社会中心分析路径突出国内政治目标,主张对外政策需要顾及对决策者国内政治地位的影响。^①为缓解民族国家与社会中心路径之间理论视角的张力,本文结合国内因素,从国家利益设定、对外政策目标、国内政治目标、外交手段以及联盟政策五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全面阐述“交易主义”的外交行为特征。

(二)交易主义的行为特征

按照上文分析路径,在国家利益设定上,交易主义外交追求有形的、短期物质利益,而非长期且抽象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素。“交易主义”基于现实主义理性选择,将国家利益设定为生存、安全、权力与威望,反对在世界范围内将价值观输出作为外交目标或实施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被视为有损国家利益。对“交易主义”外交而言,与意识形态“异质性”国家基于共同物质利益也可展开合作。^②此外,“交易主义”外交旨在通过利益交换快速获取安全收益和可量化的经济利益,注重短期、有形和即时国家利益,并不注重联盟价值观。^③特朗普政府展现出明显的“交易主义”利益观,言明美国外交政策是以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为导向,而非国际规范、联盟制度和价值观,后者被视为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障碍。^④约瑟夫·奈直言特朗普政府外交行为展现出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和狭隘的国家利益观。^⑤

在对外政策目标上,交易主义旨在比对象国赢得更多的收益,践行“零和博弈”的世界观。“交易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不存在平等互惠,无论是对盟友还是竞争对手,在互动过程中需要产生明确的“赢家”和“输家”。^⑥ 博弈双方收益之和为

① 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90-110页。

② Mohamed Aldhuhoori, “Middle Powers’ Transactionalism in the Trumpism Era,” p.616.

③ Sara Hellmüller and Bilal Salaymeh, “Transactional Peacemaking: Warmakers as Peacemakers in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of Peace Process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6, No.2, 2025, pp.312-342.

④ Shadi Hamid, “Deconstructing Trump’s Foreign Poli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5,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deconstructing-trumps-foreign-policy/>.

⑤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p.71.

⑥ Micah Zenko and Rebecca Lissner, “Trump Is Going to Regret Not Having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3,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1/13/trump-is-going-to-regret-not-having-a-grand-strategy/>.

零,一个行为体的收益是另一个行为体的损失。赢者尽可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确保损失最小化。^①在“交易主义”外交看来,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固定盟友,只有程度不一的竞争对手,对外关系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带来实际收益。特朗普政府正是以“零和博弈”的世界观来看待国际关系的,无论是与盟友还是与竞争对手互动,其均宣称要为美国缔结一系列更好的国际协议,令美国成为“赢家”,斩获更多的收益。^②正因如此,美国既有同盟关系愈发脆弱,盟友间共同规范、制度基础以及长期联盟战略收益被“赢者”思维所超越。^③

在国内政策目标上,交易主义与国内民粹主义产生了联动效应。交易主义外交与国内政治因素紧密相连,深度绑定国内政治利益,并彰显出领导者的个人主义色彩。“交易主义”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所偏爱,他们通过在国际事务上斩获交易成果,向民众兜售外交政绩,回应国内民粹主义选民诉求,维持国内权力地位。^④政治家往往利用内政与外交之间信息差,通过夸大外部危险激发国内团结,渲染外国因素导致本国利益损失。^⑤鉴于美国总统任期有限,“交易主义”能为特朗普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政治利益,将即时性外交成果纳入其总统任期内,稳固权力地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特朗普宣称代表“普通民众”反对“腐败精英”,对专业外交官僚机构极不信任,绕过官僚体系推动外交事务,利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外交信息,委任个人亲信参与俄乌和谈。特朗普在外交上追求“显著突破”而非“制度成果”,对内塑造“强人”领导者形象。^⑥此外,特朗普政府渲染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美国不公平,宣称关税政

① 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13页。

② Amanda Taub, “The Trump Doctrine: The World Is a Zero-Sum Gam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07/world/trump-doctrine-zero-sum-game.html>.

③ Galib Bashirov and Ihsan Yilmaz, “The Rise of Transac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p.167.

④ Goran Ilik and Artur Adamczuk, “The EU’s Compensatory Power Amid Global Transactionalism,” *Studia Europejskie—Studies in European Affairs*, Vol.29, No.1, 2025, p.160.

⑤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第68页。

⑥ Ehud Eiran, Piki Ish-Shalom and Markus Kornprobst, “Popu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mpion Diplom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28, No.1, 2025, pp.80-104.

策将令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此类叙事满足美国中下层白人经济诉求和身份认同,获取国内政治支持。^①

在外交手段上,交易主义偏好双边主义。“交易主义”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交易,并根据具体情况(case-by-case)灵活处理国际事务。^②究其原因,“交易主义”以获取即时性收益为外交目标,大国凭借实力优势或胁迫手段促成双边协议,可以减少国际多边机制对其行为的约束。相比之下,多边主义涉及多方参与者,要求各国对国际协议作出长期承诺,尊重国际机构共同目标、利益和规范,限制国家行为体根据具体情况临时缔结更具有“利我性”条约的可能性。为此,以长期收益和多边协调为导向的国际机制和联盟承诺不符合交易主义对外政策目标。^③特朗普政府不愿在既定国际多边机制内行事,主张通过双边谈判获取收益。他在第一任期时就曾向法国提议签署美法双边贸易协定,提供条件优于美国对欧盟整体条件。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又多次绕过欧盟开启美俄“越顶外交”,通过美俄或美乌双边会谈以及政治高层秘密通话推动俄乌止战。由此,在欧盟内部有关特朗普背叛欧洲安全利益的担忧不绝于耳。

此外,交易主义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手段,实施“同领域”与“跨领域”的联动交易。在“非对称性”国家关系中,大国将特定议题与其他议题捆绑,获取谈判优势。^④“交易主义”外交在谈判条款设计上利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操纵手段迫使对象国妥协。^⑤软硬兼施结合多种手段推进外交目标,包括制裁、关税等。虽然“交易主义”不主张使用武力输出价值观,却也以武力威胁作为谈判筹码,施压

① 修远基金会:《是什么造就了“失控”的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政治经济逻辑》,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6期,第64-72页。

② Leon Hadar, “The Limits of Trump’s 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3,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limits-trumps-transactional-foreign-policy-18898>.

③ Galib Bashirov and Ihsan Yilmaz, “The Rise of Transac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pp.166-167.

④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第49页。

⑤ Abtin Safavipour and Helia Jalalirad,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Trump’s Foreign Policy: Analyzing Key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Vol.7, No.1, 2025, p.5.

对象国妥协。^①比如,特朗普政府将海外驻军和军事援助作为奖赏或威胁对象国的手段,影响他国决策。^②由此,在美欧互动中,美欧关税协议、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和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往往被“打包”谈判。

在联盟政策上,交易主义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待盟友。传统联盟管理方式遵循长期主义逻辑,盟主利用硬实力资源补偿盟友,换取盟友对盟主的长期追随,盟友在联盟中也将获得安全保障等收益。^③在以往的跨大西洋同盟中,美欧存在深厚的情感信任。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重建,在柏林危机中美欧共同应对苏联安全威胁。美欧安全与经济互信是二战后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基辛格曾言,北约是美欧军事战略资源与道德资源整合的结果。^④冷战后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护“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联盟网络,通过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稳定联盟体系。

然而,“交易主义”外交主张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进行联盟管理,这有利于实力更强的国家,实力较弱国家只能通过经济让步等措施换取大国对其安全保障的承诺。^⑤“交易主义”认为联盟关系并非主要基于共同价值观,同盟文化与历史纽带也属于次要因素。盟主与盟友之间的物质利益交换优于联盟价值观。盟主国可通过硬实力资源补偿或惩罚盟友,首先考虑的是其能否从中获取经济与政治回报。安全上,特朗普政府凭借硬实力资源要求北约欧洲盟友分担更多联盟防务成本。^⑥经济上,美国指责欧洲国家借助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从美国攫取过多经济利

① Ville Sinkkonen, “Contextualizing the ‘Trump Doctrine’: Realism, Transactionalism and the Civilizational Agenda,” p.9.

② [美]布鲁斯·拉塞特等:《世界政治:供选择的菜单》,张传杰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页。

③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3-125;董柞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载刘丰主编:《联盟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

④ 尹继武:《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载刘丰主编:《联盟政治:理论与实践》,第163-166页。

⑤ Mohamed Aldhuhoori, “Middle Powers’ Transactionalism in the Trumpism Era,” p.616.

⑥ Anshul Vyas,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 U.S. Foreign Policy Shift During the Trump Era,” SSRN, April 21, 2025, <https://ssrn.com/abstract=5223629>.

益,要求重塑美欧经济关系,美国获取更多收益,并将风险尽可能转嫁给盟友。^①

综上所述,“交易主义”是一种拥有现实主义行为逻辑的务实性外交策略,具有狭义的国家利益观、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和民粹主义特性。交易主体是通过双边谈判和“软硬兼施”等手段实施同领域或跨领域的联动交易。“交易主义”联盟政策是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而非“共同价值观”,物质利益交换优于联盟承诺与共同历史文化链接(见表 1)。

表 1 “交易主义”外交行为特征

评判标准	行为特征
国家利益设定	狭义的国家利益观,追求有形、短期的安全与经济收益,而非长期与抽象的价值观
对外政策目标	“零和博弈”的世界观,旨在比对象国赢得更多的收益。追求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国内政治目标	通过在对外事务上迅速斩获交易成果,向国内民众兜售政绩,回应民粹主义选民诉求,绑定国内政治利益,稳固领导者权力
外交手段	双边主义外交,减少国际多边机制的束缚。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手段,实施“同领域”与“跨领域”联动交易
联盟政策	基于“成本收益”对待盟友,盟主与盟友之间的物质利益交换优于联盟价值观。盟友通过经济利益或对外政策让步换取盟主安全保障

注:表由作者自制。

三 “交易主义”外交与特朗普 2.0 时期跨大西洋关系

特朗普“交易主义”外交重塑了美国联盟政策,将美国联盟承诺视为交易条件以及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否对盟友提供联盟安全保障取决于美国能否从中获取更多物质收益,价值观与既定规则在联盟体系中作用下降,“去意识

^① Ketan Patel and Christian Hansmeyer, “Multilateralism to Transactionalism: America and Trump in the Asia Pacific,” pp.211–225.

形态化”和“去制度化”特征明显。^①“交易主义”外交将盟主与盟友之间短期物质利益交换置于联盟价值观之上,这与注重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欧盟自由主义外交理念背道而驰,从而加深了跨大西洋盟友的信任赤字。特朗普 2.0 时期“交易主义”联盟政策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重塑,尤其反映在北约联盟防务和美欧关税谈判上。

(一) 北约联盟防务上的“交易”

二战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北约中的资金分配长期不均衡,美国承担近 70% 的联盟防务开支。冷战时期,美国历任总统对此虽有不满,但很少对盟友进行“成本收益”账单核算,因为美欧防务联盟支出的差异是由跨大西洋双方实力、安全观差异以及保护与被保护的不平等关系决定的,美国通过提供更多的联盟防务支持换取盟友对其国际战略与霸权地位的追随,北约是美国维护其全球权力的重要资源。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北约功能面临转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率先提出对北约的质疑。卡根直言,北约是用美国军队与防务开支为欧洲盟友提供保护,欧洲和平秩序需要感谢依照“霍布斯”旧秩序行事的美国。^②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质疑,认为联盟安全承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制定的,当前已变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需要重新分配北约各国防务开支。^③在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的作用下,北约联盟防务从基于制度与规范的“承诺义务”变成基于“成本收益”核算的交易关系。

第一,以“狭义”的国家利益观重新定义联盟防务责任。特朗普政府主张降低美国对欧洲安全成本投入,美国在北约内提供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前提是欧洲国家为自身安全付出更多财政与军事资源。2025 年 2 月的北约防长会议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直言,美国不再容忍联盟防务关系的不平衡,欧洲须向乌

^① 袁征、陈桂芸:《特朗普 2.0 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载《国际安全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3-22 页。

^② [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3 页。

^③ 赵怀普、赵健哲:《“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克兰提供大部分援助,并承担维护欧陆安全主要责任。^①在 202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批评美国前任政府坚持全球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这掏空了支撑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中产阶级工业基础,令盟友伙伴国将国防成本转嫁给美国。^②因此,特朗普政府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长时间内既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具体且坚定有力的安全保障,也不承担停火后乌克兰重建的主要责任,并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降低美国在联盟防务中“被牵连”卷入美俄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2025 年 8 月美俄元首阿拉斯加峰会后,特朗普重申美国不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至多向驻扎在乌克兰的欧洲军队提供防空军备、情报与侦察支持。^③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英法等欧洲“志愿联盟”不得不承担更多欧洲安全责任,并承诺将对乌克兰进行战后和平保障,商讨派驻地面部队以及海军和防空支持等事宜。^④

第二,美国联盟防务的政策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特朗普政府不再将北约军事联盟视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首要资源,而是将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视为“交易资源”,将联盟防务成本尽可能转嫁给欧洲盟友,以最小代价维持北约运行,确保联盟安全收益的同时减少美国财政负担。北约欧洲国家需要为自身安全“买单”,美国军事资源不再是免费“公共产品”,美国需要在联盟防务中获取即时性物质收益。在美国的压力下,北约欧洲国家在防务资金分配上逐渐向美国妥协。2025 年 7 月,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在与特朗普会面时,北约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发起“乌克兰优先采购需求清单”(PURL)倡议,由北约各国出资认购,从美国采购军备援助乌克兰。10 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再次敦促北约欧洲盟友按照该清单增购美国武器。至 2025 年 11 月,荷兰、加拿大、德国、丹麦、挪

① C. Todd Lopez, “Hegseth Tells NATO Hard Power Provides Deterrence, Defense,” DOD New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066810/hegseth-tells-nato-hard-power-provides-deterrence-defense/>.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

③ “Spitzentreffen in Washington: Was der Ukraine-Gipfel gebracht hat—und was nicht,” Tagesschau, August 19,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amerika/faq-ukraine-gipfel-100.html>.

④ Fredy Gsteiger, “Nach Treffen in Paris: So sollen die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aussehen,” SRF, September 5, 2025, <https://www.srf.ch/news/international/nach-treffen-in-paris-so-sollen-die-sicherheitsgarantien-fuer-die-ukraine-aussehen>.

威、瑞典、芬兰、冰岛与波罗的海三国已筹集近 20 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资金。^①美欧在对乌军事援助上形成“北约协调+乌克兰订购+欧洲支付+美国出货”的新模式。

第三,美国联盟防务参与绑定国内政治目标,呼应民粹主义诉求。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呈现出“个人化”与“内顾化”趋势,强调“美国优先”,对内树立强势领导人形象。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大,国内政治极化严重。^②美国民众对建制派政府愈发失望,特朗普正是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运动斩获选民支持,两次入主白宫,他基于民粹选民经济诉求和总统个人作用处理联盟事务。2025 年 2 月的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乌援助过多。^③为此,特朗普借助国内舆论提出美国斡旋俄乌冲突要有“明码要价”。鉴于乌克兰稀土资源对美国电子、航天等国防战略行业的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将获得乌方稀土矿产资源视为调解俄乌冲突的“物质回报”,宣称这是乌克兰对美国纳税人在过去三年数千亿美元援助的补偿。^④此外,特朗普认为通过美俄元首间的私人关系可迅速斩获外交成果,避免陷入多边主义制度与规范的窠臼,以此突出总统个人作用,稳固其国内权力地位。

第四,强化大国双边外交,削弱北约各国多边协调。北约制度基础是建立在“协商一致”原则上,所有重大决定需经北约全体成员国同意,即使美国在北约内占主导地位,也需遵守联盟多边协商机制。然而,特朗普政府偏好通过双边谈判,降低联盟机制对美国外交行动的限制。^⑤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绕过欧盟和乌克兰

① NATO, “NATO’s Support for Ukraine,” <https://www.nato.int/en/what-we-do/partnerships-and-cooperation/natos-support-for-ukraine>.

② 孟维瞻、张耀:《美国政治的去极化——知识精英的反思》,载《世界政治研究》,2024 年第一辑,第 85-110 页。

③ Moira Fagan, “Americans’ Views of the War in Ukraine Continue to Differ by Party,”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2/14/americans-views-of-the-war-in-ukraine-continue-to-differ-by-party/>.

④ Heidi E. Crebo-Rediker, “What’s the Deal with Trump’s Ukraine Mineral Agreemen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1, 2025, <https://www.cfr.org/article/whats-deal-trump-ukraine-mineral-agreement>.

⑤ 孙成昊、李佳霖:《特朗普 2.0 时代重塑北约防务分担的特征、动因及影响》,第 38 页。

兰,通过美俄双边“越顶外交”推动俄乌和谈。^①在未与欧盟充分沟通情况下,2025年2月特朗普与普京通话,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指责美国罔顾欧洲安全利益对俄罗斯实施“绥靖政策”。8月美俄阿拉斯加会晤前,虽然欧盟和北约官员陪同乌克兰总统一同前往白宫表达欧洲立场,但他们只能作为旁观者,事后被特朗普告知谈判结果。^②11月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解决俄乌冲突“28点计划”在欧洲备受争议,被指美俄通过双边外交罔顾欧洲安全利益,欧盟并未参与该计划的初拟协商,欧洲国家作用再被边缘化。欧方认为美俄商定的“28点计划”在乌克兰东部领土归属、乌方军队规模及其北约成员国资质、战后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均偏向俄罗斯。虽然英法德与欧盟官员其后对计划提出修改意见,但特朗普政府却渐失战略耐心,督促乌克兰与欧洲尽快做出让步,签订协议。欧洲国家在俄乌和平进程中话语权与作用下降,北约机制内美欧多边协调功能正在弱化。^③

第五,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对待北约盟友,忽视联盟价值观。拜登时期的北约被视为美欧军事和自由价值观联盟。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及其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物质利益交换的优先级高于联盟价值观。近年来,联盟防务费用分担成为美欧争论焦点。特朗普第一任期就不断批评欧洲国家防务上“搭便车”,以美国退出北约相威胁,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国防支出。2018年北约峰会上,北约各国同意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占各国GDP的2%。^④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安全威胁认知攀升,纷纷加大国防投入。2014年北约内仅有美国、英国、希腊国防支出占比超过GDP的2%,2025年北约各国国防支出均超过2%的标准。在动荡的欧洲安全环境中,美国在联盟防务上对欧洲施压取得一定效果。十年间,美国国

^① Helga Schmidt, “Nach Trumps Telefonat mit Putin: Amerika und Europa driften auseinander,” Tagesschau,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ropa/trump-putin-196.html>.

^② Eberhard Nembach, “Kein Deal in Anchorage: Fünf Erkenntnisse aus dem Alaska-Gipfel,” Tagesschau, August 16,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alaska-putin-trump-100.html>.

^③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Kommt in Berlin Bewegung in die Verhandlungen?” Tagesschau, December 13,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ropa/ukraine-gespraech-berlin-100.html>.

^④ Frank Jordans, “President Trump,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Cordial, but No Apparent Movement on Iran,” Chicago Tribune, April 27, 2018,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2018/04/27/president-trump-german-chancellor-angela-merkel-cordial-but-no-apparent-movement-on-iran/>.

防支出从占北约总额的近七成下降至六成。但 2025 年美国国防开支为 8452 亿美元,仍是北约最大“金主”,远超过其他国家 5708 亿美元的国防支出总和。特朗普第二任期加大施压力度,以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相要挟,对北约盟友开出更昂贵的联盟防务账单。鉴于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存在结构性依赖,北约欧洲国家再次妥协。在 2025 北约峰会中,北约各国承诺至 2035 年将 GDP 的 3.5% 用于军队建设与军备采购等核心国防支出,其余 1.5% 用于和国防产业相关支出,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发展国防工业等。^①

(二) 美欧关税谈判中的“交易”

特朗普 2.0 时期的“交易主义”外交策略将经贸工具全面“武器化”,关联经济与安全议题,无论是对竞争对手还是盟友,美国使用包括关税与经济胁迫在内的各种手段施压对方让利妥协。二战后美欧共同塑造并强调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经贸秩序在特朗普 2.0 时期遭到进一步削弱。

第一,基于“狭义”的国家利益观在美欧经贸关系中追求短期经济收益。特朗普以“关税人”自称,遵循强者逻辑,认为任何贸易逆差国都是“输家”,贸易顺差国才是“赢家”,宣称各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仅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受损,还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要求与全球贸易伙伴重订协议,旨在比对象国赢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对待传统盟友也不例外,欧盟在美国的全球“关税闪电战”中亦未能幸免。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口号正是“美国赢得更多收益”的零和思维映射。^②

第二,以“零和博弈”逻辑重塑美欧经贸关系。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外交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全球经贸关系,每一次我方收益均以对方损失为代价,“零和博弈”的二元思维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简单化,对外经济关系也被视为“零和游戏”。^③为此,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情有独钟,这颠覆了跨大西

^① “Defence Expenditures and NATO’s 5% Commitment,” NATO, August 27, 20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198.htm.

^② Joel R. Hillison, “Th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of a Zero-Sum Grand Strategy,” *Orbis*, Vol.63, No. 2, 2019, pp.240-257.

^③ John Glaser, Christopher A. Preble and A. Trevor Thrall, *Fuel to the Fire: How Trump Made America’s Broken Foreign Policy Even Worse (And How We Can Recover)*, Cato Institute, 2019, p.88.

洋盟友以往所看重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规则。特朗普政府在对欧盟加征关税时,往往结合使用延迟征收、设置豁免期、在豁免期内催单等手段迫使欧盟对美国让利妥协。

特朗普 2.0 时期,美欧经贸关系进入“讨价还价”博弈期,形成“美国发起关税威胁—欧盟制衡—美国关税延期与增压—欧盟谈判与妥协”的模式。2025 年 4 月,特朗普提出对欧盟大部分产品加征 20%的“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不仅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还背离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既损害贸易对象国,也无益于美国经济利益。^①为此,特朗普政府在颁布“对等关税”行政令仅一周后又宣布延迟三个月对欧盟征税,至 2025 年 7 月 9 日前仅保留 10%的基础关税和恢复暂停多年的 25%对欧盟汽车关税。欧盟最佳场景预设是与美国达成“零关税”贸易协定,次优目标是美欧彼此将关税互降至 10%以内。但此后美欧关税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政府继续增压,威胁称 2025 年 6 月将对欧盟产品征收 50%关税。面对美国经济与安全上的双重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尽快推进关税谈判。^②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尚未取得满意经济收益前,美国持续对欧施压,选取欧盟重要经济体进行精准打击。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访问美国前夕,特朗普宣称对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产品关税从 25%提升至 50%。^③德国是出口美国钢铁产品最多的欧盟国家,占欧盟对美国钢铁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④德国也是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多的欧盟国家。2023 年德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达 633 亿欧元,2024 年增长至 700 亿欧元。^⑤德国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影响最为严重,因此最为期待

① 《破坏多边体制,损害全球经济——美“对等关税”错在哪里》,新华网,2025 年 3 月 14 日, <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14/5acc97cdba9449c495fc489ac94438fa/c.html>。

② “Trump Delays 50% EU Tariff Until 9 July,” Euractiv, May 27, 2025,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news/in-phone-call-with-trump-von-der-leyen-seeks-more-time-in-tariff-talks/>。

③ “Von 25 auf 50 Prozent: Trump kündigt Verdopplung von Stahlzöllen an,” Tagesschau, May 31,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weltwirtschaft/trump-stahl-zoelle-100.html>。

④ “Zoll-Ankündigungen der USA: Trump-Pläne belasten Stahlbranche ‘massiv’,” Tagesschau, May 31,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ropa/stahl-ankuendigung-usa-reaktionen-100.html>。

⑤ “Deutschland erneut mit deutlichem Exportüberschuss im US-Handel,” Handelsblatt,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aussenhandel-deutschland-erneut-mit-deutlichem-exportueberschuss-im-us-handel/100107167.html>。

欧美关税矛盾降级。为此,德国总理默茨督促美欧尽快完成关税谈判,形成美欧新贸易协定。默茨访美后,美国许诺对欧盟关税延迟。2025年7月上旬,特朗普又提出对欧税率降至30%。美欧经多轮关税博弈,最终,欧盟鉴于对美国安全依赖而在经贸议题上妥协。2025年7月底,特朗普与冯德莱恩会晤后,美欧在关税条款上形成共识,次月美欧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欧盟拟消除对美国大部分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放宽对美国食品、渔业产品、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同时在非关税壁垒上考虑降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欧盟可持续发展法规(CSRD)对美国企业的限制。而美国将对包括欧盟汽车、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在内大部分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出口至美国的钢铝制品仍需缴纳50%关税。^①此外,欧盟还承诺将在2028年前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采购至少400亿美元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石油和核燃料等能源。^②

在美欧关税博弈中,欧盟采取“制衡”与“妥协”双重战略应对。最初,欧盟以共同市场红利“制衡”美国关税威胁,并且表态强硬。在特朗普提出对欧盟征收“对等关税”后,欧盟准备“针对性”回击清单,并挑选出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票仓但较少影响欧洲供应链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反制,包括家禽、牛肉、大豆、乳制品、糖果、烟草制品、家具、纺织品、鞋类和冰箱等。但鉴于欧洲在安全上对美依赖,欧盟在博弈过程中延迟对美国反制措施,逐步妥协。面对特朗普20%“对等关税”,欧盟在第一份反制清单中,宣称要对总额210亿欧元美国产品加征最高50%关税,但不久后又暂缓反制,以期促成美欧谈判。当特朗普威胁称若美欧贸易谈判未取得进展,美国将对欧盟商品征收50%关税后,欧盟回应称将针对95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制定第二份反制清单,但两个月后又将该清单数额降至720亿欧元,而且并未真正实施。在博弈过程中,欧盟仍多次强调希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见表2)。

^① Melanie Jordan, “Abkommen zwischen den USA und der EU,” GTAI, December 3, 2025, <https://www.gtai.de/de/trade/usa/zoll/handelsabkommen-usa-eu-1917402>.

^② “Joint Statement on a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on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European Commission, August 21, 2025,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news/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framework-agreement-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2025-08-21_en.

表 2 美欧关税博弈进程

阶段与时间	美国行动 (威胁/延期/增压)	欧盟应对 (制衡与妥协)	进展与结果
美国发起威胁 2025 年 4 月	美国对欧产品加征 20%“对等关税”	欧盟制衡 宣称反制美国农产品与工业品。制定第一份反制清单;对 210 亿欧元美国商品实施 50%的关税; 目标:美欧达成“零关税”协议或互降关税至 10%以内	美欧相互威胁与试探,关税谈判进展缓慢
关税延迟	延迟 90 天对欧征税,仅保留美国对欧盟 10%基础关税和 25%汽车关税		
美国增压 2025 年 5 月	因美欧谈判进展缓慢,美国提升对欧盟威胁,宣称从 6 月起对欧盟大部分产品征收 50%关税	欧盟制衡 草拟第二份反制清单;宣称对 950 亿欧元(7 月降至 720 亿欧元)美国商品实施关税反制 欧盟首次妥协 欧委会宣称尽快推进美欧关税谈判	欧盟保持制衡的同时,准备以经济让步换取特朗普延迟征税承诺
对欧盟主要经济体精准施压 2025 年 6 月	德国总理访美前,美国将进口钢铁关税从 25%提升至 50%	欧盟再次妥协 德国积极推动美欧关税谈判,阻止关税摩擦升级	美国成功迫使欧盟核心成员国积极推动美欧关税谈判
美欧新关税共识 发表联合声明 2025 年 7—8 月	美国持续施压,欧盟妥协让利 在美欧经贸关系中,美国需要比欧盟获取更多经济收益	欧盟最终妥协 欧盟拟消除对美国大部分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 降低对美国渔业产品、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准入壁垒; 考虑降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可持续发展法规对美国企业的限制; 承诺 2028 年前增加 7500 亿美元的美国能源采购、400 亿美元芯片采购和 6000 亿美元对美投资; 美方获取更多收益:美国对欧盟大部分产品征收 15%关税,钢铝产品维持 50%的税率	欧美形成不对等的关税协议

注:表由作者自制。

第三,“关税战”与美国国内经济利益绑定,迎合民粹主义诉求。在美欧经贸争端中,特朗普政府打出“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旗号,为“关税战”正名。特朗普政府指责多年来美欧贸易赤字过大,欧盟对美国贸易顺差威胁美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宣称“关税战”将纠正国际贸易失衡、增加美国政府收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承诺 MAGA 选民“关税战”是为保护美国工作岗位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影响。^①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钢铁厂对员工演讲时宣布对进口的钢铁产品关税从 25% 提升至 50%,宣称要兑现竞选时“美国工作岗位为美国工人所留”的承诺,以此激发美国蓝领工人对于美欧“公平贸易”的强烈诉求,赋予“关税战”合理性与国内支持率。

第四,美国将经济与安全议题进行“联动交易”。特朗普 2.0 时期,经贸、安全与科技等议题被广泛链接,成为美国对欧盟进行“联动交易”的施压筹码。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通过关税促使对象国降低对美国贸易顺差,还以关税手段为威胁筹码,迫使对象国在边境安全、非法移民管理、芬太尼等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借助美国军事资源迫使对象国在其他领域对美让利。^②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减少对欧洲安全保障为“交易筹码”对欧盟施压,要求欧盟降低对美国汽车征税、放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标准、减少对美国科技企业监管,以此增加美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对欧收益。^③2025 年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宣称若欧盟动用《数字服务法案》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损害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欧洲利益,美国将撤销其对欧洲安全保护。^④

第五,基于“成本收益”核算重塑美欧经贸关系,欧盟通过经济让步换取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而特朗普政府通过“交易主义”外交在美欧经贸关系中获取更

① 赵明昊:《特朗普 2.0“关税战”的逻辑、特征及布局》,载《当代世界》,2025 年第 4 期,第 47-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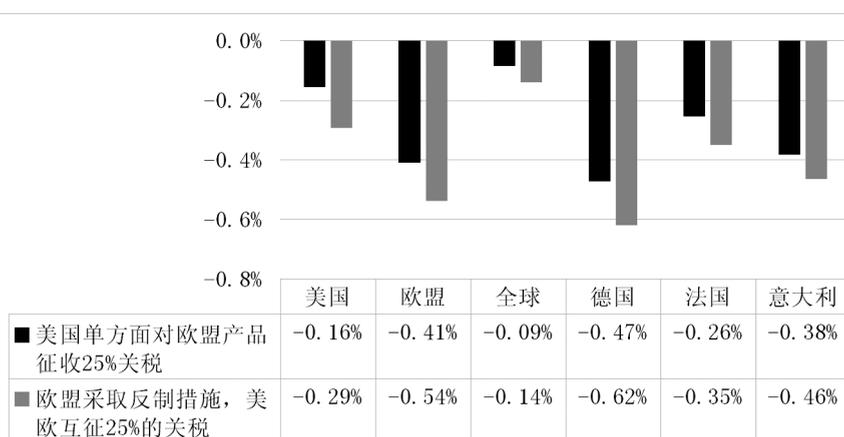
② Gene Gerzhoy, “Alliance 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 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 Nuclear Ambi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p.91-129.

③ Laura von Daniels and Stefan Mair, eds., “Trumps Rückkehr und Europas außen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en,” SWP-Studie 3,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February 2025, Berlin, p.7.

④ “JD Vance Suggested the US’s Support for NATO Could Be Pulled If Europe Tries to Regulate Elon Musk’s X as Free Speech Debate Rumbles On,”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22, 20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jd-vance-nato-support-eu-regulation-x-musk-free-speech-2024-9>.

多的即时经济收益。实际上,在商品贸易上,欧盟对美国有大额贸易顺差,2023 年达到 1570 亿欧元,这是特朗普对欧盟发起关税战的主要理由。然而,在包括数字领域在内的服务业,欧盟在对美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2023 年达 1090 亿欧元。^①为此,欧盟曾考虑动用被喻为“贸易火箭筒”的“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予以反制,包括限制美国科技企业在欧盟市场运营以及限制美国金融服务业在欧盟市场准入等。^②然而,欧盟的态度犹豫不决。首先,欧盟各国立场不一。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支持启动 ACI,认为只有通过打击美国高度依赖欧盟市场的科技产业,才能有效反制美国。但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爱尔兰、匈牙利则表示反对。欧盟成员国分歧令其在应对美国“交易主义”外交时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其次,俄乌冲突中欧盟对美国在军事资源上有结构性依赖,美欧军事

图 1 欧美关税战对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以美国对欧盟 25%关税为例)



■ 美国单方面对欧盟产品征收25%关税 ■ 欧盟采取反制措施,美欧互征25%的关税

注:图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 <https://www.ifw-kiel.de/topics/kiel-trade-and-tariffs-monitor/>。

^① “Handel zwischen der EU und den USA: mögliche Auswirkungen neuer Zölle auf Europa,” Europäisches Parl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opics/de/article/20250210STO26801/handel-zwischen-der-eu-und-den-usa-mogliche-auswirkungen-neuer-zolle-auf-europa>.

^② Max Bergman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Coming Collis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25, p.8.

实力差距赋予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更多权力筹码,欧盟不得不通过经济让步换取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最后,在美欧关税战中,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受损程度仍然高于美国(见图1)。鉴于此,面对经济与安全双重挑战,欧盟与美国持续抗衡缺少筹码,欧盟仍致力于在关税豁免期前与美国达成协议。

(三)“交易主义”外交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基于“狭义”国家利益观,在对外关系中旨在获取即时性安全收益和经济福祉,这导致美国在联盟事务中呈现出显著的“自利性”,以“成本收益”视角对待盟友,忽视联盟价值观对于维护北约机制与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作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从“基于规则”经济战略伙伴走向“零和博弈”的交易型伙伴。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重塑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扩大了美欧利益分歧与价值观裂痕。

第一,“交易主义”外交加深美欧联盟防务权力的结构性失衡。“交易主义”外交强调国家之间的硬实力差异,交易主体的经济体量与军事实力越大,利益交换点就越多。美国在联盟安全上拥有更多军事资源,对欧盟“交易筹码”更胜一筹。欧洲距防务自主尚有较大距离,对美国仍存有结构性安全依赖。多年来,欧盟发展共同防务与协同军工生产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并无实质性进展,欧洲主要武器系统数量是美国六倍之多,美国拥有30种主要武器系统,欧洲达到178种,欧洲军备互操作性较弱。^①此外,欧洲对美国火箭炮、榴弹炮弹药、防空系统等重武器的依赖度达到70%以上。^②倘若特朗普政府撤回对欧洲安全保障,欧盟在国防资金、军备供应以及核保护上无法迅速补齐短板,更难以独自应对俄乌冲突或对俄形成有效威慑。为此,欧盟不得不对美做出经济让步,承诺采购更多美国军备,以留住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欧在联盟防务上的权力失

^① Niall McCarthy, “Europe Has Six Times as Many Weapon Systems as the U.S.,” Statista, February 20, 2018,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2972/europe-has-six-times-as-many-weapon-systems-as-the-us/>.

^② Giuseppe Irto et al., “Ukraine Aid: How Europe Can Replace US Support,” Kiel Policy Brief, No.186,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March 2025, p.30.

衡。此外,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外交偏好双边外交与秘密外交,忽视北约各国多边协商传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盟与乌克兰作用一再被边缘化,北约欧洲国家在联盟防务上的话语权被持续削弱,难以在北约内对美国发挥规范与制度上“软制衡”作用,美欧防务互信下降。而俄乌冲突尚未平息,特朗普政府又对丹麦所属格陵兰岛提出主权诉求,特朗普仅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就格陵兰危机进行双边“交易式”密谈,忽视丹麦和欧盟各国意见,造成北约内部危机。

第二,“交易主义”外交重塑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从“美国责任主导”变成“欧洲责任转移”。在特朗普“交易主义”外交作用下,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不再是免费的“公共产品”。有学者提出北约“欧洲化”的观点,讨论主要集中在欧洲承担更多联盟防务成本以及未来欧洲人掌管部分北约指挥权的问题上。^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退出北约或轻易放弃对联盟防务控制权。美国仍将对欧洲提供核保护伞、关键情报与军备资源支持,但欧洲需要为美国军事资源支付相应账单,包括为援助乌克兰采购美国军备,进一步提升各国国防支出至 GDP 的 5%。此外,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其西半球主导地位,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因此,特朗普政府反对北约无限扩张。^②美国军事资源将聚焦于关键地区部署,包括东欧和北欧的关键军事通道,特朗普政府将通过高效且小规模军事存在,以较低成本确保美国对北约军事技术与行动的掌控。

在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安全支持呈现“交易化”的情形下,再度激发北约欧洲国家的防务自主意愿,承诺加强北约内“欧洲支柱”建设,增强欧洲常规军事防御力,在北约东境防御上实现自我负责。但欧盟防务自主并非是要将美国排除在外,在欧洲尚未拥有足够军事资源前仍将绑定美国,通过分担更多联盟防务成本留住美国的安全支持。^③2025 年 3 月,欧盟颁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通过增加国防投资、发展欧洲共同军工市场、促进安全合作等措施加强欧洲防御力。此外,欧盟还

^① Aylin Matlé and Rachel Tausendfreund, “Eine Europäisierung der NATO ist unabdingbar,” DGAP, January 22, 2025, <https://dgap.org/de/forschung/publikationen/eine-europaeisierung-der-nato-ist-unabdingbar>.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12, 27.

^③ Matthias Dembinski und Hans-Joachim Spanger, “Die ungewisse Zukunft der NATO,”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June 2025, p.24.

动员各成员国筹集 8000 亿欧元用于投资国防,其中 1500 亿欧元用于投资防空系统与弹药采购,增强欧洲军备互操作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此,欧盟首次允许各成员国为筹措国防资金而突破各国财政纪律。^①

第三,“交易主义”外交削弱美欧印太战略合力。拜登时期,北约在军事联盟功能之外还被赋予价值观联盟的作用。美国利用北约军事联盟和印太小多边机制构建军事、政治、经济 and 价值观一体化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推进实现美国的印太战略目标。^②欧盟对美国印太战略“亦步亦趋”。2022 年和 2024 年,美国与德法英等北约欧洲国家以及亚洲伙伴国在澳大利亚进行印太“漆黑”空中联合军演。^③然而,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削弱了北约价值观凝聚力,美欧安全合作变成“交易账单”,北约欧洲国家需为欧洲自身安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欧盟财政压力激增。此外,美俄多次绕过欧盟开启“越顶外交”,欧洲担心重现二战“雅尔塔会议”的场景,在欧洲安全议题上被大国“抛弃”或“背叛”。^④由此,欧盟陷入美欧防务合作失信和欧洲防务能力缺失的双重焦虑。当前,北约欧洲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构建对俄有效威慑,无法腾出更多防务资源发挥“印太战略”作用。^⑤在美欧安全互信缺失的情况下,北约欧洲国家很难筹集足够军事资源、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对北约“东进”做出实质性贡献。德国继 2024 年派遣护卫舰“巴登符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后,2025 年德国未再派出舰队巡航印太。^⑥

① “Bis zu 150 Milliarden Euro: EU-Staaten einigen sich auf Megadarlehen für Rüstungsbeschaffung,” Der Spiegel, May 21, 2025,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eu-staaten-einigen-sich-auf-megadarlehen-fuer-ruestungsbeschaffung-a-286b8370-143b-4fb9-a64c-9260a9f735bc>.

② 左希迎:《美国联盟体系重组的战略形态》,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3-14 页。

③ “Pitch Black 2022,” Bundeswehr.de, <https://www.bundeswehr.de/de/organisation/luftwaffe/team-luftwaffe-auf-uebung/pitch-black>.

④ 1945 年,美国、英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未来,东欧国家却并未参与。参见 Max Bergman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Coming Collisions,” p.7.

⑤ Matthias Dembinski und Hans-Joachim Spanger, “Die Zukunft der NATO: Länderstudie Deutschland. Die NATO im Zeichen von Ukraine-Krieg und Donald Trump,”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June 2025, p. 23.

⑥ Deutscher Bundestag, “Regierung: Derzeit keine Fregatten-Einsätze im Indopazifik,” November 11, 2025, <https://www.bundestag.de/presse/hib/kurzmeldungen-1121534>.

第四,“交易主义”外交削弱美欧经贸协调机制,美欧经贸关系从“基于规则”走向“零和博弈”。二战后美欧经贸关系遵循“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贸易秩序,各国付出的成本和收益虽不均等,但均可从国际专业化分工中受益,各国互动创造总收益超过总成本。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再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强大支柱。^①多年来美欧在经贸领域并非没有分歧,但双方试图通过多边机制缓解矛盾。奥巴马政府主张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拜登时期建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二者均旨在降低美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促进经贸科技战略协调以及加强西方技术标准协同。然而,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对欧盟贸易赤字视为国家利益损失,通过关税战而非多边协调重订美欧关税协议,推动美欧经贸关系“再平衡”。美国旨在比欧盟获取更多经济收益,最终形成欧盟对美国大部分产品免税,而美国对欧盟实施 15%关税的不平等协议。美欧经贸关系步入“零和博弈”阶段,推动全球自由主义贸易秩序转向保护主义主导的经济竞争,经济议题被安全化。为此欧盟主张发展全球南方多元伙伴对冲美国压力,以谋求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秩序这一问题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②

第五,在“交易主义”外交作用下,美欧对华经济与科技战略协调力下降。特朗普政府将盟友与竞争对手置于同一权力评估体系之中,实施“交易主义”外交,加深跨大西洋盟友信任危机。美欧围堵中国的战略协调机制因美欧政治互信下降而功能失灵。拜登时期美国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不仅旨在协调美欧经贸规则与科技标准,还对不同价值观的“他者”国家带有明显的排他性,美欧通过协调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形成针对中俄的地缘经济战略围堵。然而,特朗普 2.0 时期美欧关税战再起,2025 年 TTC 暂停召开部长级会议,是否存续以及以何种形式开展美欧规则协调充满不确定性。^③此外,在科技领域,欧盟“反胁迫工具”

^① Amanda Taub, “The Trump Doctrine: The World Is a Zero-Sum Game”.

^② Andreas Rinke and Michel Rose, “EU Leaders Discuss New US Trade Proposal as Deal Clock Ticks Down,” Reuters, June 2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u-cavass-leaders-summit-resolving-us-tariff-conflict-2025-06-26/>.

^③ Ellie Belton and Max Gruenig, “The Future of the 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E-Paper,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25, p.3.

曾是配合美国对华“去风险”的战略利器,但在美欧关税博弈期,欧盟曾考虑将该工具对准美国科技企业,包括在欧盟境内撤销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终止美国开发商软件下载和流媒体服务,允许欧盟机构限制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在欧盟市场准入等。^①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交易主义”外交事实上加深了美欧在经贸规则与科技标准上的矛盾,美欧对华经济与科技战略协调合力下降。

第六,“交易主义”外交令美欧陷入西方认同危机。“交易主义”外交将物质收益置于联盟价值观之上,挑战西方自由民主认同。它以权力竞争和经济利益核算为核心,摒弃基于价值观的联盟政策,削弱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且被欧盟积极维护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言欧洲“文明消亡”,抨击欧盟民主制度、经济与移民政策,支持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欧盟建制派将此视为美国对欧盟内政的干预,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的裂痕加深,西方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②正因如此,美欧在全球治理上也难以形成责任共识,美欧全球治理合作无以为继。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坚持零排放的绿色意识形态,美国不愿再作为“不可或缺国家”承担全球责任。由此欧盟面临同盟关系动荡、安全失序、全球治理赤字与西方认同危机的多重战略挑战。

四 余论:交易主义将国际秩序引入何方?

特朗普 2.0 时期跨大西洋关系从价值观“天然盟友”变为利益导向型的“交易伙伴”。在联盟防务与美欧关税谈判中,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行为展现出“交易主义”特征,如表 3 所示。

^① Andy Bounds, “EU Prepares to Hit Big Tech in Retaliation for Donald Trump’s Tariff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7303e57e-67ca-477a-8d00-8d5213f7120c>.

^② Jean-Marie Magro, “EU-Reaktionen auf US-Sicherheitsstrategie: Wir können uns auf Washington nicht mehr verlassen,” *Tagesschau*,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europa/eu-reaktionen-ussicherheitsstrategie-100.html>.

表 3 美国“交易主义”外交的政策表现

	北约联盟防务	美欧关税谈判
国家利益设定	美国以“狭义”国家利益观定义北约联盟防务责任	美国以“狭义”国家利益观对待跨大西洋经贸关系,追求即时性经济收益
对外政策目标	将联盟防务成本转嫁给欧洲盟友,美国以最小成本维持北约安全收益	以“零和博弈”的逻辑开启美欧关税战,要求降低美欧贸易逆差
国内政治目标	美国参与联盟安全事务需和国内政治利益绑定,呼应民粹主义诉求	美国通过“关税战”迎合国内民粹主义选民诉求,巩固总统权力
外交手段	美国偏好双边“越顶外交”,削弱北约各国多边协调机制	美国绑定经济与安全议题,进行联动交易,加大对欧盟施压
联盟政策	基于“成本收益”对待北约欧洲盟友,忽视联盟价值观	基于“成本收益”重塑美欧经贸关系,欧盟通过经济让步换取美国安全保障。

注:表由作者自制。

“交易主义”外交重塑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在联盟防务上,北约联盟防务从“承诺义务”变成基于“成本收益”的交易关系。在经贸领域,美欧经贸关系从“基于规则”走向“零和博弈”。在联盟价值观上,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外交思维与欧盟建制派的自由主义理念矛盾重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直言,美国无视既定联盟关系和联盟信任,美欧核心价值观差异已“摆上明面”。^①有学者提出特朗普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对盟友的冲击甚至大于对竞争对手的冲击。实际上,特朗普“交易主义”外交印证了 21 世纪初德国哈贝马斯与法国德里达等政治哲学家对美欧核心价值观差异的辩论。美国实用主义、主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偏好与欧盟自由主义、

^① “Münche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Steinmeier wirft USA Rücksichts- und Regellosigkeit vor,” Zeit Online,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zeit.de/news/2025-02/14/steinmeier-wirft-usa-ruecksichts-und-regellosigkeit-vor>.

一体化理念和多边主义原则存在固有矛盾。^①上述矛盾在美国建制派执政时期较为隐性,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却暴露无遗。

在美国“交易主义”外交作用下,欧盟在大国竞争中愈发陷入战略迷茫。近年来,欧盟确立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三重战略,该战略本就充满目标矛盾性,在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实施“交易主义”外交的影响下,欧盟对华战略目标愈发模糊。一方面,鉴于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欧盟意图拉拢美国回归传统联盟政策,在美欧互动中打出“中国牌”,试图换取美国对欧盟安全与经济政策的“宽容”。2025年G7峰会上,冯德莱恩就曾提出“中国冲击论”,呼吁美欧联手制华,炒作中方“稀土武器化”。^②另一方面,中美欧三边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竞合状态。欧盟“去风险”政策同时指向中国与美国。欧盟既力求增强防御能力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同时也要求降低对华经济依赖,推进对华“去风险”。但鉴于“交易主义”外交持续削弱美欧互信,欧盟在安全与经济上难以再完全信任美国,欧盟对华战略从拜登时期对美国的“战略追随”转向“择机而动”,根据美欧交易情况与欧盟自身利益而灵活变化。然而,基于中俄互动、中欧市场准入和关键矿产资源管制等问题,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与“对抗性”权重又不断上升。同时,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要求美国减少国际责任,2025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③美欧全球治理合作几近停摆,该领域的中欧务实合作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为此,欧盟对美与对华战略目标摇摆不定,欧盟大国关系陷入“失准”状态。

“交易主义”外交不仅动摇了跨大西洋同盟根基,同时也削弱了基于联合国宪章与多边主义原则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加深了国际秩序的动荡性。“交易主义”外交基于现实主义行为逻辑,是美国在战略收缩期对国家利益与权力地位的极力维

① “Europa und die USA,”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May 31, 2003, <https://germanhistorydocs.org/de/ein-neues-deutschland-1990-2023/europa-und-die-usa-31-mai-2003.pdf>.

② “China Blasts G7 over ‘Interference’ in Trade Policy,”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19,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china-blasts-g7-over-interference-in-trade-policy/articleshow/121938171.cms?from=mdr>.

③ Robert MacNeil, “The Case for A Permanent U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ccor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9, No.5, 2025, pp.789-796.

护,强调大国战略竞争、权力博弈、双边主义和“成本收益”核算。它与欧洲二战后历经半个世纪塑造而成的超民族国家后现代理念、规范性外交、多边主义和透明性规则格格不入。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交易主义”外交在内政与外交上赢得更多收益,宣称这将“令美国再次伟大”。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动摇的现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非西方大国与全球南方国家逐渐走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正在获得更大的国际秩序话语权。

回顾欧洲历史,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外交拥有百年前欧陆秩序动荡期的外交烙印。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后,《经济学人》杂志评论称特朗普政府通过该文件赤裸裸地宣誓权力,更接近19世纪外交风格。^①近代史上,欧洲曾多次寻求构建共有规则,平衡国际规则“合法性”与民族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以维持欧陆和平。无论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是1815年维也纳体系都是欧洲国家历经战争后建立维持欧陆均势秩序的尝试。然而,百年间欧陆“均势”一直处于脆弱的平衡中,上述维持“均势”的欧洲协调体系后又被民族国家间冲突、狂热民族主义或国内革命浪潮的外溢效应所打破。此后,欧洲秩序重心又再度转向“权力竞争”。在此期间,欧洲回到无规则与无秩序状态,秘密谈判、双边外交、利益交换、权力博弈、国内民族主义崛起成为政治常态。在欧陆秩序动荡期,各民族国家挑战既有合作框架与国际协议,又往往采用冒险性、多变性与短视性的双边外交和秘密协议,乃至频繁更换同盟,以获取即时性收益和短期外交成果,这导致危机与混乱产生。比如1887年在俾斯麦主导下,德俄签署《再保险条约》,确保缔约一方与第三大国交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作为交换条件,德国承认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权力,该条约被视为典型的双边秘密外交。俾斯麦直言,欧洲秩序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基础上,保守派可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建立一个新秩序。然而,俾斯麦能以高超的外交手段确保维持欧洲均势,防止大规模冲突爆发,但这种将安全事务系于精英个人才能上的均势体系并不可靠,往往蕴藏失控

^① “Donald Trump’s Bleak, Incoherent Foreign-Policy Strateg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5,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5/12/05/donald-trumps-bleak-incoherent-foreign-policy-strategy>.

风险。^①俾斯麦离职后,德国内政与对外政策急剧变动,打破了欧陆均势平衡。德皇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反复多变,德国激进的海军扩张策略打破原有的欧洲同盟,英德两国因海军竞赛而全面对抗,英国放弃“光荣孤立”与“离岸平衡”加入法俄同盟,德国也与奥匈帝国结盟。^②在20世纪初新技术加持下,欧洲各国都在为爆发潜在冲突做准备,任何无意识或不可控事件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如一战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大公。

国际秩序竞争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当前国际形势影射出历史回归的态势。北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矛盾尖锐,乌克兰成为平衡美欧安全关系枢纽,中美博弈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张力,国际秩序究竟是向一战前欧陆军事竞赛还是向16世纪欧亚大陆多极均衡态势回归仍存在学术争议。^③但无论如何,特朗普政府“交易主义”外交都偏离了美国外交传统,其强调的狭义国家利益、双边主义外交、权力零和博弈、短期获益,以及其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百年前欧洲秩序动荡期的各国外交策略,欧盟建制派也指责特朗普政府率先破坏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准则。当前,大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以及颠覆性技术竞争愈发激烈,美国“交易主义”外交是否会加速西方主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瓦解,未来欧洲与国际秩序又能否超越“历史轮回”重塑和平,避免回到至百年前的列强政治,值得学界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作者简介:黄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6-77页,第83-95页。

② 徐若杰:《海军竞赛与英德全面对抗的生成(1900—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9-12页。

③ 刘德斌:《战后80年:世界历史的转折与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8期,第3-24页。